

首页 → 学术资讯 → 书评文萃

苑利和他的《韩民族文化源流》

作者：祁庆富

【打印文章】

这是一本难产的书：它准备了七年，写作了六年，压了三年，从资料准备到最后出版整整用了十六七年的时间；这是一本引人关注的书，书一问世，立刻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关注：海外学界立刻着手翻译，海外出版商立刻来电商谈版权事宜；这是一本具有一定深度的书，中国学者说，这部书是近年来中国学界对外关系史研究中较有份量的一部；外国学者说，本书的问世，很可能需要人们重新审视韩国的历史。这是怎样的一部书呢？它就是最近由浙江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出版的韩国学学术专著《韩民族文化源流》，它的作者是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苑利先生。

据苑利先生介绍，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从他作研究生时开始的。那是1983年7月，当时，他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钟敬文、许钰两教授攻读民俗学硕士课程，在第二学期期末返乡的列车上，他结识了一位走南闯北的买卖人，人家听说他是研究民俗学的学生，便对他说：“你有工夫应该到云南白族地区看看，那里尽管与东北朝鲜族远隔千山万水，但有许多风俗却是一模一样”。接下来，对方又列举了好多事例。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此后这件事一直挂在他的心上。从此便开始留心这方面资料的搜集，这一干便是几年。1991年他去了日本，在东京都立大学饭仓照平先生的门下作客员研究员。他在韩民族文化来源问题上的第一篇学术论文《朝鲜民族南来考》，就是在这时期写就的。但交稿时，由于文章太长，不好收录，只好另作《大禹诞生神话与远古妇产医学》一文，算是交了差。而《朝鲜民族南来考》则被压了下来。1992年1月，就在他归国的前几天，应日本民话之会的邀请，他以此为题，在日本法政大学搞一次个人专题学术报告会，讲演底稿就是这篇论文。这也是韩民族文化南来说在日本学界的第一次公开亮相。回国后，北京大学杨通方先生领导的韩国学研究中心已经成立，并刊出《韩国学论文集》，经葛振家先生引荐，《朝鲜民族南来考》在扩充至五万字之后，在这里发表，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，相继发表了《日韩铜铎文化源出中国东南沿海考》等十几篇文章，约30余万字。其中的绝大部分文章都被译成日文或韩文在国外发表。此后应韩国中央大学、韩国民俗学会等学术团体之邀，他还在韩国的中央大学及韩国国立民俗学博物馆等地，组织了专题学术报告会，使南来说有机会与韩国同行见面。说来也巧，当时杭州大学韩国学研究所所长金健人先生去韩，在那里，苑利先生结识了这位先学，并在他的邀请下，答应写作此书。

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，关于韩文化的起源，由于研究者视野、研究方法、研究视角及所用材料的不同，结论上往往也有较大差异。迄今为止，在韩民族文化来源问题上，大致有以下几大学说，即：西伯利亚说，阿尔泰民族说，东夷民族说等等，至于韩民族与南方民族关系问题，则很少有人谈及，更不用说系统研究。苑利认为，在韩民族文化来源问题上，西伯利亚说也好，东夷民族一支说也好，都有自己的道理，也有自己的事实依据，这与韩文化的多元性格完全吻合，并不矛盾。但以往诸说的最大问题，是无法解释韩半岛稻作文化的来源问题，因为韩半岛的主体文化是与稻作文化文化一同由域外传来的，解释不了稻作文化的来源问题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释韩文化的来源问题。那么，韩半岛的稻作文化究竟源于何处？韩文化究竟源于何处呢？经过近十六七年的艰苦研究，苑利先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韩半岛稻作文化起源于中国的东南沿海，韩文化中的主体部分当直接源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百越文化。

在本书中，作者从稻作文化、人体装饰、传统服饰、饮食文化、民居建筑、生殖崇拜、婚姻习俗、青铜文化、图腾神话及语言等方面，对韩半岛与中国东南沿海百越文化的关系问题，进行了系统研究。而在整个的研究中，韩半岛稻作文化的来源问题，又是他整个学说的学术切入点。在《韩半岛稻作文化文化探源》一章中，他敏锐地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：韩民族地处北亚，这里并不产野生稻，也不适宜水稻的生产，但在这里，稻作文化居然成为韩文化核心中的核心。这就说明这里的稻作文化只能是舶来文化，那么，韩半岛的稻作文化究竟来自何方？他认为如果这个问题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，则韩文化甚至韩民族的来源问题，也将迎刃而解。在这一章节中，作者从韩半岛稻谷品种、生产工具、祈丰仪式、耕作方法等几个方面，对韩民族的稻作文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，认为，韩半岛的稻作文化当起自中国东南，而居住在这里的百越民族的传统文化，很可能是韩民族稻作文化的最终源头。在人体装饰和有关服饰的研究中，作者认为韩半岛的“魁首”、“穿脊”及穿“贯头衣”的习俗，饮食方面的食生、食犬、食米习俗以及饮食中的发酵文化等，也都与中国南方的百越文化，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该研究涉及领域之全面，在以往的研究中并不多见。

这部书稿的最大特点是靠事实说话。每一章、每一节，甚至每个观点，都有自己的材料，都有自己的证据，为了印证韩半岛稻作文

化的来源，他使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，为了证明韩半岛杆栏文化与中国东南沿海百越文化之关系，他竟从各种古籍中勾沉出数十条文献资料，与韩语进行语音学的比较，体现出了他治学严谨的一面。

在研究中，苑利先生的许多结论都是很富新意的。如他在韩日语比较研究一章中认为：既然韩、日民族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，是百越后裔的一支，那么，许多古俗在他们的语言中，也应有所残留。考之日语，他发现“干将”、“莫邪”、“欧冶子”（欧冶）等并非单纯人名，而是某些习惯称谓。如“干将”的原意是“铁匠”，“莫邪”的原意是“媳妇”，而“欧冶子”或“欧冶”的原意则是“老爷子”或“我老爹”。考之韩语，《吴越春秋》中一些令人不解的名词，也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。如书中的“物卢之矛”原来就是韩语的“铜矛”；书中炼铜之所“铜姑渎”原来就是冶炼金属的熔炉；书中的“葛党”原来即是韩语的“佩刀”等等。

苑利先生在韩民族文化来源问题上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突破，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他研究视野的开阔。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，以往人们研究韩国史利用最多的当是典籍。但这对于研究韩民族史前史来说，未免过于晚近，材料也极为有限。尽管有些学者后来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，并力图从民族学、人类学、民俗学、考古学等角度，去重新审视韩民族的文化来源，但由于当时中韩两国并无邦交，他们所进行的田野作业，至多也只能局限于前苏联、蒙古等周边国家和地区，而中国南方民族文化与韩文化的比较，始终没有纳入学术先贤们的视野。苑利先生从事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多年，对中国南方百越文化比较熟悉，因此，涉及到韩文化，特别是其中的稻作文化时，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中国南方百越文化与韩文化的关系问题。

苑利先生强调韩民族稻作文化起源中国东南，但并不否认韩文化中的北方因素，而是说，尽管韩文化中不乏北方因素，但其文化的主体部分，仍是中国南方的百越文化。这一结论是比较科学的。

苑利先生常说：通常，人们习惯于用“盲人摸象”来批评某些治学态度不够严谨的学人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却对摸象的盲人产生了某种同情亦或好感——尽管开始时他们因某些限制不能较为全面地了解对象，但是他们确实是在踏踏实实地作，实事求是地说，说象是一堵墙也好，象是一根柱也罢，人家说错了什么吗？没有。既然没有，为什么近千年来，摸象的瞎子竟然会遭到如此的攻击？这难道正常吗？求是始于求实，只有踏踏实实，一步一个脚印地探索下去，莫说是大象，就是泰山，你不也能说出它个来龙去脉么？当今的人太浮躁，当今的社会太浮躁，当今的学术太浮躁，我真幻想有那么一天，大家不再为职称作学问，不再为工资作学问，不再为那点儿被许多人当作“外快”的课题经费作学问，那样，也许才会作出真的学问来。但愿这一天能早日到来。

文章来源：中国民俗网

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，请自觉注明

“转引自[中国民族文学网](http://www.iel.org.cn)（<http://www.iel.org.cn>）”。

[与本文相关的文章](#)

- [将文学与满学的研究视线交汇起来](#)

